

傅斯年全集



第一卷



C52/173

傅斯年全集

第一卷

欧阳哲生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3540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斯年全集. 第1卷/欧阳哲生主编; 傅斯年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I. 傅… II. ①欧…②傅… III. 傅斯年-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3200 号

傅斯年全集

第一卷

*

责任编辑: 邹树德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 印刷

*

787×1092 16 开 印张: 35.5 字数: 480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4000-7/G·3995

本套定价: 408 元 本册定价: 63.8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傅斯年先生留欧时期所摄。

RAC 18/0



建于清代的傅氏宗祠，位于山东聊城东关街路北处。



傅氏一家的祖莹牌坊。



傅斯年的祖辈们在山东聊城北门内相府街傅氏祖宅院内合影。



傅斯年的母亲李氏。



傅斯年进入北大预科时与其弟傅斯严合影。

傅斯年

門第學年科學分數表

學年	科目數	實得	扣分	平均分	總計	操行	論理學	中國文學史	中國史	文學學	中國文學	科分	年分
第一學年	16	649	1	67.9	755	140	100	65	90	150	160	16	1
第二學年	16			80.1	320.5			文字學	日文	漢學編計	漢文選	16	2
第三學年	16							詞曲	言語學	文字學	漢文選	16	3
第四學年	16											16	4
總計													

一二三學年入文是

1916~1919年，傅斯年在北平大學學習成績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傅斯年为总指挥，手举大旗者为傅斯年。



傅斯年留欧时期摄影。



1921年傅斯年摄于伦敦。

地闢天開指顧中
 蔡元培

山平水遠蒼茫外
 孟真同學元正

蔡元培先生送给傅斯年的一幅对联，对傅斯年寄托无限的希望。

序言

欧阳哲生

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傅斯年是一个极具个性，而又充满矛盾的奇特结合体。他长期在北大学习、工作，对北大师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传统的正统观念，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49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代，与胡适、钱穆一起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几个代表。^①他力主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反对所谓“国粹”，反对读经，主张废除“国医”，成为“五四”以后在文化领域最激进的现代化路线的推动者。他又最具民族主义思想，坚定抵御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议苏俄沙文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纯粹学术的真正维护者，一生致力于发展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学，不畏权门豪族，言谈举止中充满“知识的傲慢”，有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概，时人有“傅大炮”之誉。他事必躬亲，治事威严，为人行政有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彻底性精神，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典范。他又致力于铲除社会不平等，体恤下层百姓的民情，为此谋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些看似矛盾、趋于两极的选择奇妙的集于傅斯年一身，酝酿一种极致化的表现，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一些爆炸性的言

^①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1374页。

2 傅斯年全集

行。“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这是他的才气和风格的一幅贴切肖像。

傅斯年只活了55岁(1896—1950年)。比起他的三位北大师友刘半农(1891—1934年)、丁文江(1887—1936年)、钱玄同(1887—1938年)来说，岁数要长；而与后逝的胡适(1891—1962年)、陈寅恪(1890—1968年)、李济(1896—1979年)、顾颉刚(1893—1980年)、赵元任(1892—1982年)诸友来说，他又走得过早。他曾是这一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他跌宕多姿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学术准备期(1896—1926年)，从他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预科、本科，直到赴欧留学，这是他的学生时代。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开始崭露头角，在留学时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学术志趣。(二)学术成熟期(1927—1937年)，这一阶段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他自称：“吾这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①说明了他奔波于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匆忙。(三)行政工作期(1937—1950年)，这一阶段他除继续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职外，另还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等教育、学术行政职务，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立法委员等政职，他的重心明显转向以学术、教育的行政工作为主，甚至卷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动。^②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即题赠“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③寄望于他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傅斯年留学归国后，他的留德同学陈寅恪亦赋诗

①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序。

② 关于傅斯年的一生，胡适将傅斯年思想分为“学生时代的思想”、“壮年时代的思想”和“晚年的思想”，但胡适未段分壮年和晚年之间的具体时间，参见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原载1952年12月21日《台湾新生报》。

③ 此题词收入王汎森、杜正胜：《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5年12月16日出版，第31页。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① 鼓励他主持复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业。为不辜负师友的期盼，他一生奔走劳碌，因此而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才般的能量。

傅斯年的一生刚好跨越了20世纪上半段，这正是中国一个极其混乱而又充满变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远不足以我们形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变数之速，由此而导致评判傅斯年的两极对立，甚至多极差异，也不足为怪。时人以“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来说明对傅斯年所牵涉的是非关系和人事纠纷难以评判。但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傅斯年那狂狷独立的行世风格、尽忠报国的民族情怀，已深深的熔铸于北大人历史传统之中。中研院曾是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初期领导者，傅斯年那威仪严苛的“老虎”作风、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已成为史语所学派的一种象征。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誉，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发挥影响，但其事功和业绩可能是平平而已，这种人死后的影响力自然是迅速萎缩；还有一种人是生前并未享高位，也不拥有重权，但以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在生前死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傅斯年属于后者，胡适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② 在一个看不到多

^① 《寄傅斯年》，《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8页。

^②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原载1952年12月21日《台湾新生报》。收入《胡适作品集》第25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3月出版，第54页。

4 傅斯年全集

少希望的历史时期，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何况傅斯年一生有接连不断的大手笔表现。当我们仔细探求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艰难行进的线索时，就不难发现傅斯年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凡表现。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① 这是 50 年前胡适对傅斯年的一段评语。作为乃师兼友的胡适生性并不好走极端，知人论世，在此一口气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足见其对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许。^② 在傅斯年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海内外有关傅斯年的追思、纪念性的文字持续不断，但这些追忆不约而同地都是为胡适的这段评语补充注脚。^③

研究和评判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传统项目。但这一项目并不因为历史悠久，而为我们能驾轻就熟地掌握。恰恰相反，由于历史长河的延伸，累积于历史人物的人为因素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判越来越容易依赖于主观的能动

① 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收入《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台北：台湾大学，1952年12月出版。

② 胡适一生写过的纪念性文字中，对三人的情感表达最为强烈：徐志摩、丁文江、傅斯年，这三人可谓胡适的至友。

③ 有关纪念傅斯年结集的文字有：《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1年3月出版。《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台湾大学，1951年出版。蔡尚东编选：《长眠傅园下的巨汉》，台北：故乡文化出版事业经纪公司，1979年3月29日出版。《傅孟真先生传记资料》（3册），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傅斯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台北：中国上古秦汉学会，1995年12月出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96年11月。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王富仁、石兴泽编：《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7月出版。

性。一般来说,时间的间隔对历史的认识更具科学的价值。这是因为时间的距离感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可以排除当事人的各种是非关系,不因个人的恩怨而产生对认识对象的随意褒贬;二是随着历史的延伸,人们所依存的社会环境超越了历史的存在,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天然地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然这两种可能的实现也有一个必需的前提,这就是对历史资料的充分掌握。没有历史资料,历史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缺乏历史资料,将导致我们对历史认识产生许多盲点。今天我们来讨论傅斯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已具备了许许多前人不曾具备的学术的、社会的、史料的诸种条件,因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超越前人的认识水平,以我们现今所具有的历史涵养和认识能力,对其做出合乎时代高度的判断。

一、早期的学术准备

傅斯年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三个阶段^①:第一个阶段为学前、小学、中学阶段(1913年夏以前),此段现存资料甚少。^②第二个阶段为北大预科、本科阶段(1913年夏—1919年夏),此段可资研究材料甚多,除北大保留的教务档案可备查外,还有他的同学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俞平伯等人的回忆和日记,^③以

^① 有关傅斯年学生时代的分期,何兹全先生亦分三段,即1901—1908年,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1909—1919年,在天津读中学,在北大读预科、本科;1920—1926年,在英、德留学。参见何兹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前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21~22页。

^② 有关傅斯年的这一段学生生活,参见英千里:《回忆幼年时代的傅校长》,原载1951年1月8日《台大校刊》第101期。

^③ 有关傅斯年在北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参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伍倏:《忆孟真》,收入《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出版,第62~63页。毛子水:《我与孟真的交往》,载1976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俞平伯:《别后日记》,收入《俞平伯日记》第1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147~152页。1919年顾颉刚留有未刊的日记,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第53页。

6 傅斯年全集

及傅斯年本人在《新青年》、《新潮》发表的大量作品。第三个阶段为在英国、德国留学阶段（1920—1926年）。^①其中在北大这一段，他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投入新文化的激流，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在留学时期，他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酝酿自己的学术思想。

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京大学预科分二类（1915年9月以后改为二部），^②一类偏重文史，二类偏重于自然科学。傅斯年选择了一类，因他英文程度较好，被编在一类英文甲班。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从同文馆发展而来。由于这一历史关系，北京大学预科的课程安排，外语学习的分量所占比重很大，必修两门外语课程。傅斯年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三年的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

1916年秋，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此时政局大变，袁世凯去世，黎元洪上台。黎为制衡北洋系的旧班人马，尽力在反袁或非袁派系中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教育总长人选故有任命范源廉之举。范在民初与蔡元培有过共事经历，两人关系密切，遂又延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这对北大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另一个影响傅斯年的环境因素是北大国文门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担任教员的有：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陈伯弢、黄季刚、刘申叔、伦哲如、刘农伯、吴瞿安、朱逸先、马叙伦、马幼鱼、刘文典、周作人、刘半农、崔适等，可谓极一时之选。傅斯

^① 有关傅斯年在欧洲留学生活的回忆，参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毛子水：《我与孟真的交往》。俞平伯：《国外日记甲集》1920年1—2月部分，收入《俞平伯全集》第10卷，石家庄：1997年11月出版，第153—163页。另有关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的学业档案，参见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载1997年8月《北大史学》第4辑。

^② 毛子水先生称，1913年北大预科分甲乙两部的说法，不确。参见傅乐成：《傅斯年先生年谱》1913年条，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9月出版，第260页。

年能够在学业上迅速成长，与新文化运动的风气熏染有关，这批教师的授业之功实在也不可湮没。受到朴学大师章太炎一家的影响，北大国文门的文字学教学分量颇重，三年都安排了这门课程。对此，傅斯年后来评论道：“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清朝人的第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①这应是他学习这门功课后的经验之谈。

傅斯年初入国文门时，被章门弟子看中，他们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象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②这种情形因胡适的到来和新文学运动在校内的影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过程，毛子水有一段记述：

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犖，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③

从傅斯年率学生赶走章门弟子朱蓬仙一事已可看出他对旧学的不满足。^④为什么傅斯年会由章门转向胡门？我们从他发表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可窥见他的来由，他在讨论清代学术的发展历史时，把清代学问分成五期，第一期为“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一般朴学的先进，都归在里头”；第二期为

①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1卷第4号。

②④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③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收入《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台湾大学，1951年版，第1页。

“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江慎修的时代”；第三期为“极盛期”，“就是钱晓征、戴东原、段懋堂、王怀祖的时代”；第四期为“再变期”，“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的时代”；第五期为“结束期”，“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先生两人”。在他看来，康有为的学问止于戊戌；“至于章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何以这样说呢？

第五期是结束第二、第三两期的：太炎先生结束第三期，康有为结束第四期。我以为这一时期非常有关系，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说是中国的学艺再兴时代。国粹派的主义，当然从此告终；自此以后，必不再会有第一二流的国粹派的学问家。^①

正是看清了国粹派已成强弩之末，他才不屑为国粹派的尾巴，而宁愿作新学术的先锋。

傅斯年的这一转变是在1917年秋天以后，胡适在北大登堂讲中国哲学史，在学生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这实际上是胡适在学术殿堂与章门别立门户的开始。傅斯年和一批学生受到胡适的吸引，开始投身到“文学革命”的旗帜下，1918年夏天，他们组织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创刊《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②傅斯年担任主编，胡适被邀为顾问。在此之前，傅斯年已投稿

^①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1卷第4号。

^② 《新潮杂志社启事》，载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

《新青年》，完全成为胡、陈一系的马前卒了。

傅斯年在《新潮》、《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文学语言、社会与人生、学术评论三类，体裁形式则不拘，论述文、书评、随感录、诗歌均有。

在文学、语言方面，傅斯年表现了附应“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倾向，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实在是对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的响应，开首即说：“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者多矣。蒙以为此个问题，含有两面。其一，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其二，对于未来文学之建设加以精密之研究。”“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共喻而已。”^①新文学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学，实行“文言合一”。为此，傅斯年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运动。他对文字改革极为热衷，所作《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声明：“我决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文字。”^②这篇文字是针对吴稚晖先生“汉字决不能改用拼音文字的意见”^③而发，而倾向于钱玄同先生的意见。^④傅斯年对戏剧一目的革新也抱有兴趣，当胡适、欧阳予倩与北大学生张厚载作文讨论戏剧改良问题时，他对于戏剧

① 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②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原载1919年3月1日《新潮》第1卷第3号。

③ 吴稚晖：《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原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④ 钱玄同：《论注音字母》，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改良，也从“旧剧的研究”、“改革旧剧所以必要”、“新剧能为现在社会所容受否”、“旧戏改良”、“新剧创造”、“评剧问题”、①“编剧问题”②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自己对戏剧改良的意见。张厚载为旧剧极力辩护，傅斯年偏于“主张新剧”。他说：“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③他认为：“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④由此入手，他要求文学、美术是入世的、平民化的，这正是“五四”新文学价值取向的共同特征。

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的激流，由章门后学变为新文学的排头兵，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⑤傅斯年的转变，对引领北大学生起着样板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个性解放运动，转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观。作为这一时代浪潮中的弄潮儿，傅斯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表现了浓厚的热情，为此撰写了《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原》、《心气薄弱之中国人》、《社会自知与终身之事业》、《社会——群众》、《社会的信条》、《破坏》、《一段疯话》、《中国狗和中国人》

①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

②③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原载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号。

④ 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⑤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收入《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页。